

■青春岁月

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韩晓岗 文/图

今年九月份，习近平主席给抗战老战士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抗战英雄的身份象征，是对他们的一种敬意，亦是对历史的正视反思。

我党历史上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都有不同内涵的纪念章。可以说每枚纪念章都蕴藏着一段故事，让人温故知新，引人无尽思索。

我母亲袁希昭1949年5月参军，1951年3月入朝作战，1954年初转业。母亲在部队的五年中得到了两块纪念章。

第一枚是“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近4公分圆章，章中有“雄鸡”地图，其中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省份用凸透线；上沿四面飘扬的八一军旗，褐色齿轮、金色麦穗拱卫两边；章下“解放西南胜利纪念”八字赫然入目。章后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1949-11-1-12-27”字样。这是解放西南五省的起止时间。

1950年5月，母亲在15军时得到这块人生第一枚纪念章。

母亲在安徽安庆参军到二野四兵团15军，后到兵团军大学习。当时部队向西南边陲进军，路途遥远，要步行军穿越千山万水。为此，军大中队指导员沈刚

及时做思想工作，她说我们今天的步伐会留下历史的痕迹，祖国人民不会忘记我们的。解放前，内地人不愿意去边远城市。领导们有效的思想工作，坚定了学员们解放大西南的决心。母亲随部队一路向西打赣州、取广州，在广西梧州度过1950年的元旦，而春节是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里度过的。这个春节，没有鞭炮灯光、没有人群街面；漆黑的夜晚，只有怒号的山风伴随着林涛的呼啸，那战马的嘶鸣与围着篝火的部队战士，他们或和衣枕枪而眠，或围聚憧憬而坐……构成一幅万山丛中战士奔沙场小憩的水墨画，那情景使老母亲至今难以忘怀。

在贵州少数民族区域，当地人惊恐的眼光和学员们热情的宣传形成反差。当看到部队纪律严谨不侵扰，把自己的粮食放到村民那破旧的窝棚里时，他们才对这些“兵”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部队每到一地除了扫残敌、剿匪徒以外，还要宣传群众，动员青年入伍。1950年部队在四川剿匪又接收一批热血青年入伍。在发纪念章时就有人议论：袁希昭是四川人，她不应该得到这枚纪念章。领导解释了此事后，大



家也就释然了，议论变成了羡慕的眼神。

母亲得到的第二块纪念章是抗美援朝纪念章。纪念章正中是毛泽东头像，下方有“抗美援朝纪念”铭文，外环闪耀光芒的红

五角星。背面有“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赠，1951”的文字。

母亲1951年3月入朝。出国前就颁发了这枚纪念章，她把纪念章放到行李里，存到15军在邢

台留守处。即把对祖国和家人的眷恋深深的藏在纪念章里。大家都做好了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准备。1952年5月，母亲携金达莱的花香，披着战火硝烟回到祖国，第一件事就是戴上这枚纪念章。那时候，全国各地正在轰轰烈烈地支援抗美援朝，形成“一人入朝，全家光荣”的氛围；追求光明、向往进步、崇尚英雄、尊重先进是当时社会的主旋律。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胸佩纪念章是很光荣的事情，这种感觉只有那年代的人才能领悟。妈妈到医院时，医生护士围拢过来热情打听朝鲜情况，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打量这个年轻的志愿军军人，几乎是给予了一路绿灯的照应关照。一位和妈妈同部队的战友，因生育而未出国。看到妈妈的纪念章总是羡慕有加，并心生埋怨不该那时候怀孕生育，失去了得到纪念章的机会。

60多年岁月的流淌，使纪念章失去了往日的光亮，但历史的痕迹已定格其中。纪念章记录着那段时光，闪烁着英雄们的身影。

■家庭相册

我这一辈子

□刘文英 口述
郝宝璋 整理

看着相册中这些熟悉的照片，刹那间，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在读高小时，我曾被日本兵抓过三次、活埋过一次，最后想尽办法才逃出魔爪。因此，我决心参加抗日。1943年，我在家乡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当上了干事，并任村财粮委员。那些日子，我们经常组织儿童进行抗日宣传，带领青年给八路军传送情报，配合民兵进行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就这样，我们又一次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8年，我先后参加青风店、石家庄、保定、平津等战役。保定战役时，我带领两个排的马车负责给前方供应弹药。平津战役时，在北京周边敌特复杂的情况下，我带领180辆马车连夜把接管下来敌人的大量子弹、炮弹运往前线。在这些战役中，因出色地完成上级的任务，我受到了领导机关的表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被送到解放军兽医大学学习深造。自1960年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主持完成了“五号止血粉”的研究。

1976年，我转业到吉林兽医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当时，该所十几年基本没有搞科研，并且



▲上世纪60年代，刘文英（左）在军事医学院与战友留影。

没有正规的规章制度，试验仪器陈旧、课题少、经费少，只有几万元，无法开展工作。针对这些情况，我首先用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整套正规科研管理方法，建立了科研上的各种规章制度，使科研工作都按规章制度进行，发动科研人员深入基层调研。1978年，我分别在部队立了三个课题项目，在省科委立了三个课题项目，在局里立了四个课题项目。由于立题准确，部、省、局都给研究所拨发了充足的科研经费。由于经费充足，又买了大批仪器，所里的科研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为进一步开展科研打下了较好基础。

在深入调研期间，我发现由进口种公牛羊改良的牛羊中副结核传染病在全国都普遍存在，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偶蹄动物多发病，但我国在该病的诊断、免疫、治疗上均是空白。我便建议全部立项攻关并报农牧渔业部批准，我们首先攻克了诊断关，堵

住该病进入我国，并培训了全国各地进出口动物检验人员。1982年，国家从英国进一批种公羊，用刚研究出的诊断方法，一次就检出副结核病羊80多只，当时获英国赔偿40多万元。由于该病诊断、检验研究成功，国外进入我国的牛羊等动物再也没有发生副结核病的传播。

此后，我主动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最难的项目《牛副结核病的治疗研究》课题，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仅用几年时间就攻克了这个国外用几十年时间都没有攻下的治疗难题。后来，此治疗方法用在治疗畜禽性疾病，疗效很好。

如今，我已是88岁的老人了，现在定居北京的天通苑。在社区里，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这些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原因，身体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些疾病，我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居委会的组织下，义务为老年人讲解保健养生的知识。



■工友情怀

我与工人师傅有交情

□辛述光 文/图

别看退休前我在单位也是个一部之长，可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架子，包括各部室的领导、小青年，甚至后勤部门、炊事班的工人师傅，我都能打成一片。

照片中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都是后勤班的骨干。他们俩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单位的六层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是礼堂有会或演出，他们也得帮着布置主席台、摆放桌椅等。虽然每天都

是忙东忙西，但他们俩也从不叫苦叫累。我与他们二位很谈得来，经常是谈工作、谈家庭、谈生活。他们的家都住在远郊，平常住在单位宿舍。有时工作忙需要加班，或夜里去工地采访、照相回不了家时，我就会到他们的宿舍休息片刻。

如今，我们老哥哥仨都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我与他们仍保持联系，经常通话互致问候。